

语言经济原则

——俄汉口语对比研究

Принцип языковой экономии
сопостав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русской и китайской разговорной речи

王晓娟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引 言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口语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科后，口语研究不断深入、系统化，呈现百花齐放的发展趋势。口语研究成为当前语言研究和语言教学中的一个热点。口语学的兴起，口语资源的开发，大大拓宽了语言学家的视野。口语研究的深入发展使得语言学家对语言系统和语言功能的描写日趋全面，日趋完善。口语研究推动了现代语言理论的发展，语言学家以丰富的口语资源充实了语音、语法、词汇、修辞等学科；口语研究还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口语的共性研究能揭示交际环境是如何影响语言结构的。近些年来，语言学家们除了探讨口语的特点及其表现手段、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关系、口语与书面语的相互影响外，还探讨口语与社会语言学、口语与心理语言学、口语与语用学、口语与言语行为理论、口语与信息论等学科之间的关系，论述之丰、角度之广说明了口语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在口语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原则从口语研究之始就备受重视。经济原则是推动全民语言发展的动力之一，追求省力的动机普遍存在于人类的一切理性行为之中。现代社会生活以及现代思维方式要求并促使语言尽可能地省时省力，最大限度地实现经济原则。尤其是日常生活中，在保证交际正常顺利进行的情况下，人们更倾向于简洁、省力，遵循“言以简洁为贵”，即用最少的言语单位达到最大的交际效用，这种倾向存在于人的一切言语行为之中。

本书的研究对象及目的：

本书在共时层面上对比分析了经济原则在俄、汉口语语音、构词、词汇、句法层面上的具体运用，旨在发现这一原则在俄汉口语中的异同，揭示语言发展的趋势；本书还从交际失误角度出发强调经济原则并不是口语运行所唯一遵循的规律，并不是所有“经济”的表达都能达

到预期的效果；相反，过于经济的表达手段会导致信息的缺失，甚至造成交际失误。

本书研究的新意及理论价值：

(1)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要求人们在最短时间传达最大量的信息，经济原则成为人们日常交际中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促使语言发展呈现简化趋势。因此，对口语经济原则的研究顺应了时代的要求；

(2) 经济原则在口语中占统治地位，然而学者们对经济原则的论述最初以书面语为分析材料；真正的研究是从口语研究开始的。本书首次对经济原则在俄、汉口语语音、构词、词汇、句法各层面中的表现手段进行了全面、深入、系统的描写及对比分析，并从交际语用的角度指出要辩证地看待这一规律，重视经济原则的负相关性，避免使用过于“经济”的表达手段而造成的交际失误；

(3) 本书首次对俄汉口语语音的经济原则的表现做了对比分析；首次提出经济原则在俄汉口语各层面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语音层面表现为省力，构词层面——词化，词汇层面——语义紧缩，句法层面则表现为省略。

本书研究的实践意义：

(1) 本文语音、构词、词汇、句法中的大量例证可为俄语口语教学、编写俄语口语教材提供丰富的语料；

(2) 本书的研究对俄语学习者、教师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实践性强。本书在论述的同时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口语例证，并借助与汉语口语的对比，让俄语学习者对俄语口语语音、构词、句法规范有系统了解；第三章至第五章的例句均译为汉语，有助于增强学习者对俄语口语句型的感性认识。我们认为十分有必要让学生了解口语体系，了解这些所谓“不规范现象”恰恰是属于口语的正常现象，最终目的是使他们能听懂快速语流中的话语，提高言语实践能力。

本书的研究方法：本书采用了口语研究的分析法、归纳法及对比法。我们除了对俄汉口语中经济原则的表现手段进行了共时的描写和

分析，还着重采用对比法对比了这些表现手段在两种语言口语语音、构词、词汇、句法中的共性和个性。

本书分析材料的来源：口语不仅用于日常生活，还用于社会生产、科研活动中非正式、个人间的交流。因此我们选材时也力求涵盖较广的范围，材料力求反映现代生活中的口语现象。例证来自 1) 作者随时收集记录下的日常生活实例；2) 俄罗斯和中国现代电影、电视、广播节目；3) 俄罗斯和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小说、话剧）及报刊杂志等。选取这类材料是为了弥补笔录中可能出现的片面性。因为仅仅通过记录这条渠道获得材料不一定能反映口语的全貌，可能包含某一方面的材料，而缺少另一方面的，这无疑会给语言事实的描写和概括带来片面性。4) 俄汉、汉语口语著作中的少量例句；俄语口语研究的语料集：《РРР Тексты》(1978)，《Живая речь уральского города》(1995)，《Речь москвичей》(2005)；我们还选用了《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конца XX века. Приложение. Тексты》(2000) 以及《Рус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ный диалог. Приложение》(2005)

本书在选取材料时力求突出“新”这一特点，希望能通过这些鲜活的例证发现现代俄、汉口语的发展趋势。

本书结构：全书由引言、正文六章、结论和参考文献组成。

引言中主要介绍了课题的由来、研究对象的界定、主要任务、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研究方法及材料来源等。第一章简要概述了俄、汉口语的研究历史和发展现状，论述了语言经济原则在欧洲、俄罗斯、美国及中国的研究历史，提出了本书的研究对象。第二章对比分析了俄、汉口语语音层面中经济原则的表现。经济原则在俄汉口语中均表现为发音省力，但因两语言类型不同，其表现手段也各不相同：俄语是音节语言，因此省力通常会使得元音弱化、脱落至零，辅音脱落、重组，整个音节脱落产生新音组；汉语则受类型制约表现出各种语音省力情况，本章重点论述了轻声现象。第三章则是在大量实证的基础上对比了经济原则在构词法上的表现，探讨了俄汉口语中相应的构词模式。第四章对比了俄、汉口语词汇层面中受经济原则的制约产生的语

义紧缩现象。第五章探讨了经济原则作用下的俄汉口语词组简化现象；分析了俄语口语中的几个典型句子结构：不完全句、零位动词句、叠加句、话语中断句和无连词句，并与汉语口语中的相关现象做了对比。第六章从语用的角度探讨了在交际中过度使用简洁、经济的表达手段导致的交际失误，指出交际不仅应遵守简约的原则，还要以满足交际需要为准。

在结论中对本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概括，提出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目 录

第一章 口语及语言经济原则的研究回顾	1
第一节 口语研究回顾	1
第二节 语言经济原则研究概述	8
第二章 省力——语音层面的经济原则	25
第一节 概论	25
第二节 俄语口语语音中的经济原则	26
第三节 汉语口语语音中的经济原则	39
第三章 词化——构词层面的经济原则	45
第一节 俄语口语构词研究	45
第二节 汉语口语构词研究	50
第三节 俄、汉口语构词模式对比	52
第四章 语义紧缩——词汇层面的经济原则	82
第一节 语义紧缩的研究	82
第二节 俄汉口语词汇层面中的语义紧缩现象	84
第五章 省略——句法层面的经济原则	101
第一节 俄语口语句法研究	101
第二节 汉语口语句法研究	103
第三节 制约口语句法特点的因素	104
第四节 俄汉口语词组的简化	113

第五节 不完全句	119
第六节 零位动词句	131
第七节 话语中断句	142
第八节 叠加句	155
第九节 无连词复合句	161
第六章 信息量不足造成的交际失误	167
第一节 交际失误研究概述	167
第二节 影响交际的超语言因素	170
第三节 俄、汉口语中交际失误的对比分析	173
后记	203

第一章 口语及语言经济原则的研究回顾

第一节 口语研究回顾

20世纪50年代口语成为一门独立的语言学科。口语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语言学界长期以来重点研究的学科之一。俄罗斯的口语研究从20世纪后半叶全面展开,著述涉及口语语音、构词、词汇、句法层面,形成了口语学体系。与俄语口语研究相比,汉语口语起步晚,真正的口语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才进入蓬勃发展阶段,汉语口语研究突出表现在句法层面上。近些年来,口语研究日渐深入并系统化。语言学家们除了从共时层面探讨口语的特点及表现手段、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关系、口语与书面语的相互渗透之外,还从其他角度研究口语与社会语言学、口语与心理语言学、口语与语用学等学科之间的关系,论述之多、角度之广说明口语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 俄罗斯的俄语口语研究

“从20世纪初开始,俄语书面语发生了许多明显的变化,如简化、分解、分指、融合等,无不是受口语影响的结果(王福祥,2001:1)”。俄罗斯的俄语口语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 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口语研究的准备阶段:1923年,Л П Якубинский的《论对话言语》成为俄语口语研究的奠基之作。该文揭示了对话有别于其他言语形式的基本特征,其中许多重要的观点,如交际的直接性、话轮的快速交替和相互关系以及制约性、句子的不完整性和简洁性、语境对于言语交际的重要性、“统觉基础”理论及其对口语的影响等,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口语研究受到很多限制。因为,受传统语法理论的影响,口语被标准语排斥在外,被视为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粗俗语言。

(2) 第二个阶段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前苏联语言学界就口语问题进行了大讨论,学者们一致认同口语区别于书面语的特点,并开始使用录音材料来研究口语。口语句法的系统研究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Н Ю Шведова的《俄语口语句法概论》为俄语口语学的

研究奠定了基础。作者以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对话为语料，分析了口语体的句法特征，对口语句法的生成机制与表现形式做了详尽的描写分析和高度的概括。这个时期还有 А А Никольский (1964)，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1965)，О А Лаптева (1966) 的论著。

(3) 20 世纪 70~90 年代是口语研究的鼎盛时期：口语研究全面展开，各地区陆续出现了口语研究机构和小组，并各有侧重。以 Е А Земская 为代表的前苏联科学院口语课题组将口语看作与书面语对立的语言系统，他们对口语的各层次进行了系统研究，出版了《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1973)，《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Общие вопросы. Словообразование. Синтаксис》(1981)，《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и проблемы обучения》(1987)，而 1978 年出版的口语录音资料《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Тексты》成为以后口语研究重要的语料来源。Е Н Ширяев，Л А Капанадзе，Е В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а，М В Китайгородская，Н Н Розанова，М Я Гловинская 均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领导的萨拉托夫学派拥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和传统，萨拉托夫大学每年出版的论文集反映了口语研究的各个层面。这一学派有 И П Глотова，Н И Кузнецова，Т Р Коновалова，В А Богданова，Н И Ильминская，М А Кормилицына，Н И Цуканова，Т В Кочеткова，Г Г Полищук，Е П Захарова，Т В Китаева 等。不过除了 1983 年的《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в системе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стил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Лексика》，1992 年的《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в системе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стилей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литературного языка. Грамматика》以外，萨拉托夫学派没有系统的专著。О А Лаптева 及小组以研究口语句法见长。М Н Кожина 领导的彼尔姆学派侧重研究口语在内的功能语体，他们在语言和言语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期研究口语的学者还有 Г Г Инфантова，А Н Васильева 等。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由 Н Ю Шведова 主编的苏联科学院 1980 年《俄语语法》。这部著作充分体

现了俄罗斯语言学家的口语研究成果。作者明确指出“如果不将口语形式纳入《俄语语法》，语法描写必然显得内容贫乏、随意、片面、不完整（Рус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ом 1, 1980: 13）”。这部著作标志着口语学作为一门语言学科的地位已经确立，它将口语现象作为现代俄语标准语的一个分体纳入到语法体系中，彻底改变了传统语法只研究书面语，把经典作家作品视为学习语言的典范，而轻视口语的倾向（王福祥，2001: 5）。继 Е А Земская,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О А Лаптева 等口语小组之后其他地区也有了研究口语的机构，如以 Н А Купина 为首的叶卡捷林堡学派与彼尔姆学派的方法相同，研究城市居民言语和功能语体（主要是社会群体的俚语和行业语）；布拉纳乌尔学派侧重文学作品的语言及其中的口语成分，代表人物 А А Чувакин；以 А П Сквородников 为首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学派则研究言语中各类感情表现力手段和省略成分。这些学派陆续出版了研究口语的文集，如《Вопросы стилистики》，《Язык и общество》（Саратов），还定期举办区域间或国际研讨会，其成果以论文集形式出现，如《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писания разговорной речи》。此外，继 1978 年的《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Тексты》之外，又出版一些同类的口语录音材料，如：《Живая речь уральского города. Тексты》（Екатеринбург, 1995），《Современная русская устная научная речь. Тексты》（1999），《Речь москвичей》（2005），这些录音材料为深入、全面研究现代俄语口语、城市居民言语提供了真实、可靠的来源。

综观俄罗斯学者口语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到研究从四个方面展开：

（1）探讨口语在民族语中的地位的问题：代表人物有 Е А Земская（1973），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1974），О А Лаптева（1966, 1976），К Кожевникова（1968）；除了探讨俄语口语在民族语言中的地位之外，还将俄语口语与其他语言的口语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探讨口语的共相问题，揭示口语的运行机制，如，与德语的对比：Кривоносов

(1964), Девкин (1967); 与法语对比: Шигаревская (1970), Лейчик (1970), Долинин (1978); 与英语对比: Э Н Плеухина (1984, 1990), Ю М Скребнев (1985), Т И Скворцова (1986), В Б Лебедев (1997), О М Мунгалова (1998), А А Попов (1998)。

(2) 对口语各层面的翔实、具体的描写, 其中研究成果最丰富的是口语句法: 代表人物有 Н Ю Шведова (1960), А А Никольский (1964),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1965), О А Лаптева (1966, 1976), Е Н Ширяев, Е А Земская, Е В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а (1973), Г Г Инфантова (1973), Е Н Ширяев (1981); 其次是对口语形态的研究, 如: Е В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а (1973), Е А Земская (1983); 对口语语音的研究以 Г А Барина (1971, 1973), Н Н Розанова (1983), Н Д Светозарова (1988) 为代表; 而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1974, 1983), Л А Капанадзе, Е В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а (1982), Л А Капанадзе (1983) 等以口语词汇研究见长。

(3) 除了对口语各层面详细具体的研究外, 语言学家们还从心理语言学角度展开讨论, 确定口头言语生成时的心理语言学特点以及言者和听者对言语的理解, 如: А С Маркосян (1983), Т Ф Дубовцева (1989), Е В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а (1990),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М А Кормилицына (2001), Г Г Инфантова (2001)。

(4)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 分析交际者的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域)、年龄、性别等特点对言者选择语言手段时的影响, 如: Рябова (1982), Е А Земская (1988), Е В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а (1988), С Санджи Гаряева (1988)。

(5) 从篇章语言学角度, 即口语话语角度进行研究的有: И А Барина (1988), Н Н Гастева (1990), М А Кормилицына, О Б Сиротинина (2001), Г Г Инфантова (2001), Т И Мартыненко (2005) 等。

上世纪 80 年代俄语口语的共时、平面研究基本结束, 学者们开始研究城市口头言语的分体: 俗语、讲演语、电视语言等。其中研究

城市居民的言语,言语体裁(жанры речи)的有 Л А Капанадзе(1988), Н Н Гастева(1993), О П Ермакова(1996), М Ю Федосюк(1996), Я Т Рытникова(1997), О А Михайлова(1997), И А Стернин(1999), О А Лаптева 对电视语言的研究颇有成效,著有《Жив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с телеэкрана》(2000),还有学者研究口语对标准语的渗透,尤其是对报刊政论语言的影响,如 В Г Костомаров(1994)等。

2.中国的俄语口语研究

我国俄语界的学者对俄语口语的介绍和研究涉及口语的所有层面,并且在引介俄罗斯口语学理论的同时又结合中国人学俄语的角度开展口语研究,并将研究成果运用于实际教学之中。

我国的俄语口语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王福祥教授在《俄语学习》杂志连续 6 期发表了《俄语口语常用句型》,成为中国俄语口语研究的起点。“文革”后,自 70 年代末俄语口语研究再次展开,至今已见丰硕成果。从专著和发表的论文来看,我国俄语口语研究已基本形成了三大中心:1)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口语系统研究:徐翁宇及其博士生;2)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口语语法、口语修辞、演讲语研究:王福祥、汪嘉斐以及他们的博士生;3)东北:东北师范大学孙夏南的口语句法研究、黑龙江大学赵为、荣洁的口语教学研究(王永,2005)。

中国的口语研究包括:

(1)对俄罗斯口语学的介绍:许贤绪、杨希钺主编的《俄语口语句型》(1984),祝肇安、何荣昌主编的《现代俄语口语句法》(1987),孙夏南的《俄语口语语法》(1989),徐翁宇《俄语口语语法概论》(1990),张会森《俄语口语及常用口语句式》(1994)。此外,徐翁宇及其博士生王冬竹在 1996~1997 年《外语研究》上开设了 12 讲现代俄语口语讲座,全面介绍了俄语口语的研究成果:口语及其特点;口语词汇;口语构词;口语称名;口语常用词类;口语里的分析语因素;口语简单句;口语疑问句;口语复合句;口语词序;成语化结构;会话结构。2001 年出版的王福祥教授的《现代俄语口语概论》则是

从形式、修辞、语用等角度出发，对语音、构词、形态、句子、词序、对话等各层面作了静态和动态的分析研究。他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俄语口语学”研究这一课题于 2002 年底已出版了四部专著，除《现代俄语口语概论》外，还有隋然的《俄语会话重复反应语句交际—语用研究》（1999）；吴君的《现代俄语口语溶合结构》（2001）；史铁强的《俄语口语形态学》（2002）。

（2）俄语口语与教学之间的关系：我国学者论述了口语研究对口语教学的指导意义以及口语教学的方法：高维彝（1993）；范维杰（1994）；荣洁、赵为（1995）；徐翁宇、王冬竹（1996）。

（3）俄汉口语共性问题：徐翁宇、王冬竹（1996）；许高渝（1997）；崔卫（1997）。其中崔卫对俄汉英三种语言的口语共性进行了详尽的分析，研究涉及了语词、语句和话语等层面。

3. 汉语口语研究

汉语语法研究从古代到现代历来偏重于书面语，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口语语法。自“五四”运动后，白话文正式从“不登大雅之堂”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成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汉语口语才开始在汉语标准语中取得了自己应有的地位，但口语研究并没有展开。20 世纪 30~50 年代的汉语语法研究著作中传播了当时西方语言学有关语言研究应以口语为主而不应局限于书面语的理论。这一时期有廖庶谦的《口语文法》，他强调汉语语法研究，提出“我们所研究的语法应当是我们当前口头上的语法，尤其是一般大众口头上的口语语法（陈昌来，2002：86）”。50 年代初丁声树等著《现代汉语语法讲座》中例句选自当代著名作家，这与俄语口语研究最初选材的来源相同。“文革”期间汉语语法研究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当代第一个进行严格意义上的汉语口语研究是赵元任。他的《汉语口语语法》（1979）是在大量日常口语录音和笔录材料基础上分析了汉语语法结构，对构词法和句法现象的分析更是对今后汉语口语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0 年代，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学术界引进大量从 60 年代到 80 年代的各国语法理论，以填补之前二三十年里的学术空白。汉

语语法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趋向，自此汉语语法研究进入繁荣发展时期。对语法研究的对象也有了更科学的认识。朱德熙 1987 年在《现代汉语口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一文中强调“北京口语语法的研究是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基础（朱德熙，1987）”，促使汉语语法研究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吕叔湘、张志公等都强调口语研究的重要性，注意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异同。

我国学者对汉语口语的研究分别从几个角度展开了：

（1）对汉语口语的普遍问题的研究，如：陈建明《北京口语漫谈》（1982）、《汉语口语》（1984）、《如何进行口语调查》（1986）、《汉语口语研究》（1991）、《汉语口语研究的新态势》（1992）；吕叔湘《汉语句法的灵活性》（1986）；劲松《北京口语的语体》（1989）；曹炜《现代汉语口语词和书面语词的差异初探》（2003）；陶印红《口语研究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2004）。

（2）语法研究，即对汉语口语中的某些具体口语现象进行分析探讨，如：陈建明《汉语口语里的追加现象》（1984）、《北京口语里的同义重复现象》（1990）；刘宁生《汉语口语中的双主谓结构句》（1983）；詹开第《老舍作品中的北京口语句式》；史有为《紧缩句句型三种》（1986）；陆俭明《汉语口语句法里的易位现象》（1986）；孟琮《口语里的一种重复——兼谈“易位”》（1980）、《口语“说”字小集》（1984）；张伯江、方梅《汉语口语的主体结构》（1994）、《北京口语易位现象的话语分析》（1995）、《对话语体的主位形式：易位现象分析》（1996）；杨德峰《口语中述语与补语之间的易位现象》（1998）；邓思颖的《经济原则和汉语没有动词的句子》（2002）；张静《现代汉语口语格式 V+te+MQ》（2004）；于芳芳《一种口语中的否定表达式：Q 才 VP》（2006）；荣晶《汉语口语体受事前置句》（2006）。

（3）从语用角度对汉语口语进行研究：张伯江、方梅《汉语口语里的主位结构》（1994）；马忠香、欧阳俊林《用合作原则分析汉语口语中省略句的会话含义》（2004）；牛毓梅的《经济原则和结构

简约的语用解读》（2004）；杜道流《复述话语语用策略中的可证性分析》（2006）。

（4）从话语、交际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方梅《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话语标记功能》（2000）；匡小荣《口语交谈中的话语打断现象》（2005）；《汉语口语交际中的话语重叠现象》（2006）。

（5）语义角度的研究：左存云等《基于语义分类树的汉语口语理解方法》（2006）等。此外，对外汉语口语教学、机器翻译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也为汉语口语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前景。

我国学者也建立了汉语口语语料库，早期有北京大学中文系林焱先生指导下的三期（1982~1984）北京话系统调查的自然口语录音的文字撰写材料；后来有胡明扬主持的《北京话口语语料库》，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现代汉语口语语料库，共收入 100 万字的真实口语材料。不过从汉语口语研究论著中使用语料的来源看，该语料库的使用频率无法与苏联科学院 1978 年出版的《Русская разговорная речь. Тексты》相比，我国大多数学者更常使用当代作家的作品或自己收集的语料。

从发表的论著可以看出，与俄语口语多层面、多方位的研究相比，汉语口语研究还很薄弱，主要集中在语法层面上，而语义和语用层面的研究起步较晚，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第二节 语言经济原则研究概述

日常言语交际中，语言使用往往遵循经济原则，“如果一个词足够的话，绝不用第二个。”（陈新仁，1994）因为从信息传递看，简洁、缩略的表达形式无疑要比繁复、冗余的表达更能迅速地传递人的思想、情感。现代社会快速的生活节奏引起的竞争感和匆忙感使得人们在说话和写作时越来越追求简单、经济。“言以简洁为贵”，莎士比亚的这句名言可谓恰到好处地反映了现在语言的现状。

1. 欧洲学者的研究

对语言经济原则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当时的哲学家积极寻找语言的共性特征，加上各国之间的交流增多，出现许多翻译中的

障碍，于是产生了创造一个共同的“世界性语言”的想法。正是为了构建完美的人工语言，哲学家们提出语言结构应该遵循经济的原则。法国哲学家、纯理性主义代表人物笛卡儿（R Descartes）在 1629 年写道：“人工语言必须只有一种变位法、变格法和构词法……这种语言根本就不会有错误形式。动词变位和构词只借助词典里有的、附加在词首或根词后的词缀。一般人借助这本词典可以在六个月内掌握这种语言（Зубкова Л Г ， 2003： 67）”。这种语言经济的思想后来被引入到对自然语言的研究中。

语言理性主义在法国达到巅峰。1660 年出版的《普通唯理法》是该学派代表作。其中关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论述就是以笛卡尔理性主义思想为基础。在论述语言表达与结构的一致性时，作者注意到人们总力图缩短句子和短语的长度。如 *Пётр есть живущий*. 通常说 *Пётр живёт*。在言语交际过程中倾向于简洁（*краткость*）……与此同时，作者指出意义和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并不是一种意义只有一个对应词，也并不是一个词就对应一个意义。为了达到简洁这一目的人们总是将不同的意义放在一个词里（Зубкова Л Г ， 2003： 69~71）。

19 世纪 70 年代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青年语法学派强调语言的历史性，提出语言是朝着方便、简化、节省气力的方向发展。如其代表人物保罗（H. Paul）有关消除“多余”的语言手段，使用经济的表达手段的论述。在《语言史原理》一书中，保罗专门用一章论述语言手段的经济性。他认为标准语中允许任何形式的冗余现象，而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却试图摆脱类似的多余成分。他写道：“应该承认，简略是语言的基本属性，表达形式永远不可能等同于表达内容。因此，表达方法之间的区别仅仅是省略程度的不同。”古尔替乌斯（G Curtius）也认为，语音变化的原因是贪图发音方便，用方便的发音动作代替不方便的，将复杂的发音动作换成简单的，如把塞擦音换成为擦音（[t > [s]）。

法国语言学家帕西 (P.Passy) 在 1890 年曾提出过语言演变的“最少用力原则” (закон наименьшего усилия), 认为语言经常试图去掉一些多余的东西, 这一原则总是促使人们寻找“轻松”的发音动作。但同时他又提出与这一原则对立的“强调原则”, 即如果说话人在说话时忽略了重要成分, 别人就不会理解他, 他就得从头开始说, 并正确发出重要的词。因此, 当第二个原则起作用时, 第一个原则就不存在了。

索绪尔 (F de Saussur) 在分析语言变化诸原因时指出一些语音现象可以用最少用力原则 (закон наименьшего усилия) 来解释, 两个发音动作被一个代替, 难的发音动作被较容易的代替。如塞音变成擦音, 许多语言的尾音节脱落, 以及同化现象。但同时也举例说明存在相反的, 即发音要用力的情况 (Ф де Соссюр, 2004: 142)。

索绪尔的学生、结构主义日内瓦学派的代表人物巴利 (C.Bally) 在分析语言变化的原因时有这样的论述: 为了满足交际需要, 语言可以帮助说话人和听话人用最少的力气、最准确的方式传达意思……语言可以通过调整和简化的手段接近这一理想的目的, 调整和简化的目的是使最大数量的语言行为自动化并变成潜意识的东西 (Алпатов В М., 2005: 162)。

另一位日内瓦学派的语言学家弗莱 (A.Frei) 指出, 语言的经济性反映在两个方面: 言语和记忆。言语形式的简洁或经济要求尽量缩短语言单位的长度, 减少其数量, 而记忆上的经济则要求减轻记忆负担 (Агранат Т В, 1993: 11)。

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 (O Jespersen) 于 1922 提出“省力说”。他在研究大量的欧洲语言后发现, 近代语言具有形式简短、发音简单、容易记忆、结构更规则、句法中的不规则现象更少等诸多优点, 并得出任何语言都经历了从复杂到简单的发展历程, 语言简化是一种大趋势的结论。他认为, 所有人身上都有一种心理力量在起作用, 那就是倾向于“懒惰、惰性、逃避、随便、散漫或其他已被发明的表示‘省力’或‘避难就易’的动听的同义词 (李朝, 2006)”。叶氏指出, 人们在说话的时候总是要尽量省力 (minimizing of effort), 也就是遵循极